

《四庫全書總目》之 「《春秋》學譜系」蘊涵的思維方式

江毓奇*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生

摘要

《四庫全書總目》所蘊涵的學術觀點，往往為後世研究者反思性的起點。以《總目》與「《春秋》學」相關論題為例，根據前行研究的成果，主要研究方向有：(一)釐析《總目》內涵之「《春秋》學史」進而提出辨正，並探討其時代性學風的影響因素與意義；(二)反思《總目》對於「《春秋》學」的基本觀念，從而析論其對歷來「《春秋》學」的評價與缺失。除此之外，四庫館臣在撰寫歷代《春秋》學著作提要的過程中，仍有下列幾點值得注意者：1.「館臣以三傳辨分各家春秋學之通變關係時，蘊涵了什麼樣的思維與視角？」2.「『舍傳求經』的評論對於館臣分疏歷代《春秋》學脈有何意義？」3.「館臣又如何根據以上的基礎建構其『官方《春秋》學』的典範？」。

對此，本文將嘗試從「《春秋》學譜系」的角度來思考《總目》尚未被闡明的相關思維。即以《總目》之「總敘—小敘—提要—案語」的結構中對於歷代《春秋》學之著作，在「義例方法」與「精神目的」等面向之繼承與分流關係的論述中，試圖揭顯這些論述背後的觀點理路，藉以闡明四庫館臣在其「《春秋》學譜系」中的思維方式。

關鍵字：《四庫全書總目》 《春秋》學譜系 思維方式 義例方法 精神目的
範型性經說

《四庫全書總目》之 「《春秋》學譜系」蘊涵的思維方式*

江毓奇*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生

一、問題的討論與提出

就文獻學的角度而言，「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一直是目錄之作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尤其在「經稟聖裁」^①出自聖人的典範意義下，當《四庫全書》所錄存之「詁經之說」^②被賦予映照「垂型萬世」^③的期待，則無論其功能性目的是指向政治氛圍或是學術價值，抑或是二者之間同體而異用，^④《四庫全書總目》（以下簡稱《總目》）所蘊涵的學術觀點，往往可作為後世研究者反思性（reflective）的起點。^⑤以《總目》與「《春秋》學」之相關論題為例，根據前行研究之視域，主要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老師細心的建議與指正，本文皆參酌建議修改完成。

① 清·永瑤、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11月）（該本以浙本為底本、參以武英殿本、粵本互校），卷一，經部總敘，易類一，頁1。

② 同前註。

③ 同前註。

④ 此處之「同體異用」，係指《四庫全書》的編纂在「政治氛圍」與「學術價值」的交互關係中，其「目的」實「同體」而密不可分，然其「功效」卻又「異用」而有所分別。相關背景問題，請見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年）。

⑤ 關於《四庫全書總目》之學術觀中的反思性（reflective）問題，請見劉兆祐：〈民國以來的四庫學〉，《漢學研究通訊》，第2卷3期（1983年7月），頁146-151；周彥文：〈論提要的客觀性、主觀性與導引性〉，《書目季刊》，第39卷第3期（2005年12月），頁23-38；楊

的研究方向有：

- (一)釐析《總目》內涵之「《春秋》學史」進而提出辨正，並探討其時代性學風的影響因素與意義。^⑥
- (二)反思《總目》對於「《春秋》學」的基本觀念，從而析論其對歷來「《春秋》學」的評價與缺失。^⑦

凡此，皆為《總目》之「《春秋》學」的研究貢獻了許多開拓性的基礎。除此之外，四庫館臣撰寫歷代《春秋》學著作提要的過程中，仍有下列幾點值得注意者：其一，就《春秋》學之源流正變而論，〈春秋類敘〉曰：「說經家之有門戶，自《春秋》三傳始，然迄能並立於世」；^⑧二曰：「中唐以前，則《左氏》勝，啖助、趙匡以逮北宋，則《公羊》、《穀梁》勝」；^⑨三曰：「孫復、劉敞之流，名為棄傳從經，所棄者特《左氏》事跡、《公羊》、《穀梁》月日例耳」；^⑩四曰：「其推闡譏貶，少可多否，實陰本《公羊》、《穀梁》法，猶誅鄧析用竹刑也」。^⑪顯見館臣在辨章各家之《春秋》學的時候，主要以三傳為「參照性基準」或者說以此為《春秋》學的「原型」（prototype）。如是，則館臣以三傳辨分各家春秋學之通變關係時，蘊涵了什麼樣的思維與視角？仍值得進一步思考。其二，就《春秋》學的詮釋基礎與方法而言，館臣對於「舍傳求經」的現象多有批評，然或因撰者之故，或以文脈之異，就語言的字面意義（literal meaning）而

晉龍：〈「四庫學」研究的反思〉，《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期（1994年3月），頁349-394；〈「四庫學」研究方法芻議〉，《乾嘉學者的治經方法》（上）（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0年10月），頁17-54。

- ⑥ 例如夏長樸：〈《四庫全書總目》對宋代經學的觀察——以《春秋》學為例〉，台北：台灣大學，第四屆中國經學國際研討會宣讀論文，頁147-168；謝德勝 鹿苗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的宋代「春秋學」〉，《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09年10期），頁33-362。
- ⑦ 例如丁亞傑：〈春秋寓於史：《四庫全書總目》的春秋學觀〉，《儒學研究論叢》第三輯（台北：台北市立教育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儒學中心，2010年12月），頁185-208。
- ⑧ 清·永瑤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六，春秋類一，春秋類敘，頁210。
- ⑨ 同前註。
- ⑩ 同前註。
- ⑪ 同前註。

言或時有扞格之處。如館臣於劉敞（1019-1068）《春秋傳》提要時云：「其書皆節錄三傳事蹟，斷以己意，其褒貶義例，多取諸《公羊》、《穀梁》」；¹²而在張尚瑗（?-1701-?）《三傳折諸》提要時則說：「自孫復、劉敞之徒倡言廢傳，後人沿其流派，遂不究事實，而臆斷是非」¹³等。其中，「節錄事蹟」與「不究事實」、「倡言廢傳」與「取諸公、穀」之間的差異性應如何詮釋等，皆徵顯出「舍傳求經」之意義的層次性問題，則「舍傳求經」的評論對於館臣分疏歷代《春秋》學脈有何意義？其三，館臣又如何從上述的理解中反思官方《春秋》學典範的建構？凡此，亦值得我們更進一步的討論。

對此，有別於前行之研究經驗，本文將嘗試從不同的角度來思考《總目》尚未被闡明的相關思維。嘗試說明如下：「譜系」之辭或可推源於《隋書·經籍志》所載之〈譜系篇〉，內容錄存了帝王諸侯、公卿子爵等世姓之書，目的則在於「別生分類」、「紀其所承」與「錄其見存」。¹⁴而本文所稱「《四庫全書總目》之《春秋》學譜系」則類比其意，主要指四庫館臣就其「總敘—小敘—提要—案語」¹⁵的結構中對於歷代《春秋》學之著作，在「義例方法」與「精神目的」等面向之繼承與分流關係的論述。而這些論述又包涵了：四庫館臣等「集體作者」本身在提要中所代表的「主要論點」，與援引各家序說、資料等「支援性論點」。準此，則本文之目的，則希望揭顯這些論述背後的觀點理路，藉以闡明四庫館臣在其「春秋學譜系」中的「思維方式」（modes of thinking）。

¹² 清·永瑤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六，春秋類一，春秋傳，頁 215。

¹³ 清·永瑤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九，春秋類四，三傳折諸，頁 239。

¹⁴ 唐·魏徵等《隋書》，（台北：鼎文書局，1975 年），卷三十三，〈經籍志〉，頁 990。

¹⁵ 《四庫全書總目》於其〈凡例〉云：「四部之首各冠以總序，撮述其源流正變，以挈綱領。四十三類之首亦各冠以小敘，詳述其分併改隸，以析條目。如其義有未盡，例有未該，則或於子目之末，或於本條之下，附助案語，以明通變之由。」，參見卷首，頁 18。

二、以《春秋》學之解釋基礎重塑其「範型性經說」的意義與效用

本節所謂「範型性經說」主要指傳統經典詮釋史的脈絡中，某些先行詮釋者之目的、方法與模式，在後起詮釋者之「繼承/轉化」與「批判/認取」的理解關係中，逐漸形成其詮釋基礎而有其基準性意義的解經著作。而這種基準性的內涵，或者顯化為「正向範型」的典範意義，又或者間涵於「負向範型」的批判思考，其探索的基本單位亦非指某家之說全然為「正向」或者「負向」。在後起詮釋者不同情境的研究目的中，「範型性經說」均可能兼有或者不同的「正向」與「負向」意義，主要的思考起點，或者在於先行詮釋者之經解的實質內涵與後起詮釋者對於它的理解與應用。

以《四庫全書總目》為例，就上一節所引〈春秋類敘〉的情況，已可發現以三傳之差異作為北宋前期以前《春秋》學性質的分判。此中，館臣所云：「中唐以前，則《左氏》勝」，或依張舜徽（1911-1992）之疏曰：「自唐初修《五經正義》，取《左傳》以配《易》、《書》、《詩》、《禮記》以成五經，其傳布亦廣，而《公羊》、《穀梁》之學漸微」。¹⁶如此，則「《左氏》勝」即指在官方權威認可的情況下，遂使「經解」逐漸兼具「經」之文獻性的特質，則《左傳》在《五經正義》頒定後「經傳一體」的傳習中，較之《公羊》、《穀梁》，自然成為習經者不能忽略的理解基礎。除此之外，館臣又云：「啖助、趙匡以逮北宋，則《公羊》、《穀梁》勝」，又或以張氏之說：「至啖助、趙匡說《春秋》，始稍立異。以為左傳敘事雖多，釋經殊少，猶不如公穀之於經為密。北宋劉敞傳《春秋傳》十五卷，事蹟皆節錄《三傳》，斷以己意；褒貶義例，則多取《公羊》、《穀梁》，皆不無偏袒」。¹⁷顯見啖助（724-770）、趙匡（?-779-?）以來，

¹⁶ 張舜徽：《四庫提要敘講疏》（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頁23。

¹⁷ 同前註。

「《左傳》是否傳經？」或「《左傳》釋經的效度與否？」等問題意識，亦關係到《公羊》、《穀梁》與《左傳》之學在其「範型」意義上的區別，進而影響後起詮釋者對於三傳「範型」的應用。依此，本文將進一步探討館臣如何從不同的視域中，建構三傳所表徵之「《春秋》學」的解釋基礎。¹⁸

（一）「言說活動」與「書寫行為」之傳習方式及其詮釋基礎

歷代經師大儒對於《春秋》學的詮釋問題，往往依其對三傳的理解、評價與應用而有所差別。就孔子即「聖人大義」的傳習角度觀之，或者如劉歆（50B.C?-23A.D）所云：「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之後，傳聞與親見，其詳略不同也」。¹⁹依此，「傳聞」與「親見」主要是從傳經之人是否「去聖未遠」或「親炙聖人」作為《春秋》學的詮釋基礎，但劉歆並未明言究竟「傳聞」與「親見」將造成什麼層面的詳略與差異。對此，館臣則有不同角度的滲入，如程端學（1278-1334）《春秋三傳辨疑》提要云：

平心而論，左氏身為國史，記錄最真，公羊、穀梁去聖人未遠，見聞較近，必斥其一無可信，世寧復有可信之書？²⁰

雖然館臣主要的目的在於批評「舍傳求經」的現象，但同時也可見館臣從「記錄」與「見聞」之傳習方式的差異，對於三傳之《春秋》學的基礎進行認知與分判。在此，「記錄」主要指《左傳》的傳習本於「書寫行為」；而《公羊》、《穀梁》

¹⁸ 除了本文從「思維方式」層面切入《總目》之「目錄學」與「春秋學」視角下，三傳所表徵的《春秋》學解釋基礎之外，蔣年豐則早已先從「興的精神現象學」角度，通過「歷史意識」與「精神現象」的層面，探討其中的相關問題。詳見氏著：〈從「興」的現象論《春秋》經傳的解釋學基礎〉，收錄於楊儒賓 黃俊傑編《中國古代思維方式探索》（台北：正中書局，1996年11月），頁85-134。

¹⁹ 引自清·朱彝尊撰林慶彰等主編：《經義考新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卷一百六十九，頁3087。

²⁰ 清·永瑤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八，春秋類三，春秋三傳辨疑，頁226-227。

之「見聞」則指經師口耳相傳之「言說活動」。然而，館臣對於「書寫行爲」與「言說活動」在《春秋》學的詮釋情境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判斷，如童品（1466?-1518?）《春秋經傳辨疑》提要云：

《春秋》三傳，《左氏》采諸國史，《公》、《穀》授自經師，草野之傳聞，自不及簡策之紀載，其義易明。²¹

依此，館臣以「采諸國史」與「授自經師」、「草野之傳聞」與「簡策之記載」對比，主要是就「文獻在客觀上的相對確定性」著眼。則以「書寫行爲」爲基礎的《左傳》學自然要比以「言說活動」傳授的《公羊》、《穀梁》學來得相對穩定。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並不是說義理內容上，《左傳》對於《春秋》的詮釋完全勝過了《公羊》、《穀梁》，就如同毛奇齡（1623-1716）《春秋簡書刊誤》提要所云：「考《左傳》雖晚出，而其文實竹帛相傳，《公》、《穀》雖先立於學官，而其初皆經師口授，或記憶之失真，或方音之遞轉，勢所必然，不足爲怪」。²²據此，「竹帛相傳」與「經師口授」對於《春秋》學傳習的分別，依館臣之見，主要還是在文獻存真的標準中，經說學脈如何延續的問題。如此，在「三傳俱出於聖人」²³的歷史認知中，可知館臣透過對於「傳習方式」的觀察，區分「書寫行爲」與「言說活動」的差異，以重塑三傳之「範型性經說」義涵的分別面向。然而，三傳之傳習方式的差異，又與其作爲「範型性經說」的不同特質而有所關係，本文將在下一小節中繼續探討。

²¹ 清·永瑤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八，春秋類三，春秋經傳辨疑，頁230。

²² 清·永瑤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九，春秋類四，春秋簡書刊誤，頁237。

²³ 除了上文劉歆之說外，又如賀循曰：「《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轉引自《經義考》，頁3071）；啖助曰：「三《傳》分流，其源則同，擇善而從，且過半矣」（轉引自《經義考》，頁3227）

（二）「經」、「史」內涵的同異問題及其理解關係

對於《春秋》學的理解，孟子（前372-前289）的論述一直有相當大的影響。其中，「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²⁴一段，更為歷來詮釋者思考《春秋》學解釋架構的起點之一。進而，不論從「事」、「文」、「義」哪一個角度進行探討，似乎都不能忽略《春秋》學中，「歷史事實」與「經學大義」彼此交互而聯繫的關係。以《四庫全書總目》而言，館臣於馬驢（1621-1673）《左傳事緯》提要云：

三傳之中，《左氏》親觀國史，事蹟為真，而褒貶則多參俗議。《公羊》、《穀梁》二家得自傳聞，記載頗謬，而義例則多有師承。《朱子語錄》謂：「《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謬。」蓋篤論也。²⁵

就館臣的「主要論點」而言，「親觀國史」與「得自傳聞」仍是延續前文所論「書寫行為」與「言說活動」的差別，而所謂「事蹟為真」與「記載頗謬」則不僅是就前文所謂「文獻在客觀上的相對確定性」著眼，更指向於「歷史事實」的敘載層面；而「褒貶則多參俗議」與「義例則多有師承」則在文獻存真的問題之外，進一步顯示「經學大義」的評判標準。如此，又以館臣引據所謂「《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謬」之「支援性論點」觀之，《左傳》與《公羊傳》、《穀梁傳》，在館臣以「經」、「史」之交互理解作為《春秋》學之詮釋基礎的標準下，則互有短長。

除此之外，就前人對於《春秋》學之「經」、「史」特質，館臣亦有不同於前的討論，如《四庫全書總目·春秋類四》後之案語曰：

²⁴ 清·焦循《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5月），頁572-574。

²⁵ 清·永瑤、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九，春秋類四，左傳事緯，頁237。

《春秋》三傳互有短長，世以范甯所論為允。甯實未究其所以然也。《左氏》說經所謂「君子曰」者，往往不甚得經意，然其失也。不過膚淺而已。《公羊》、《穀梁》二家，鉤棘月日以為例，辨別名字以為褒貶，乃或至穿鑿而難通。三家皆源出聖門，何其所見之異哉？左氏親見國史，古人之始末具存，故據事而言，即其識有不逮者，亦不至大有所出入。《公羊》、《穀梁》則前後經師遞相附益，推尋於字句之間，故憑心而斷，各徇其意見之所偏也。然則徵實跡者，其失小，騁虛論者，其失大矣。後來諸家之是非，均持此斷之可也。至於《左氏》文章，號為富豔，殘膏賸馥，沾溉無窮。章冲聯合其始終，徐晉卿排比其對偶，後人接踵編纂日多，而概乎無預於經義，則又非所貴焉。²⁶

據此，嘗試分析如下：

1. 館臣對於范甯（339-401）所商榷者，主要可從兩個面向來理解：(1)《春秋》學詮釋分化的原因；(2)三傳作為《春秋》學之詮釋基礎所涉及的問題。而(1)繫乎於(2)之問題的理解。
2. 就(1)而言，范甯在《春秋穀梁傳集解》序所謂：「《春秋》之傳有三，而為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²⁷繼而，館臣認為范氏從《春秋》詮釋史分流之「實然」而論，並沒有回歸三傳的「特質」而論其差異。如此，則《左傳》之「君子曰」所蘊涵的「經義」問題，或《公羊傳》、《穀梁傳》之「日月例」所蘊涵的「史實」問題都無法徵顯。
3. 如上所論，復以(2)之問題觀之，范甯所云：「《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²⁸此中，「富而不誣」、「清而不

²⁶ 清·永瑤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九，春秋類四，案語，頁244。

²⁷ 轉引自清·朱彝尊撰 林慶彰等主編：《經義考新校》，卷一百七十四，頁3185-3186。

²⁸ 同前註，頁3186。

短」、「裁而不俗」的標準，往往僅指向文章之結構與筆法，就館臣的觀點而言，並不能解釋三傳作為《春秋》學詮釋基礎的「特質」。

4. 承上所述，則館臣所謂「左氏親見國史，古人之始末具存」、「《公羊》、《穀梁》則前後經師遞相附益，推尋於字句之間」，仍是回歸「歷史事實」與「經學大義」兩個面向進行分判；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經」與「史」的特質亦具存於三傳之中，但館臣所謂「徵實跡者，其失小」主要指《左傳》偏重於「史」的層面，而缺失相對較少；「騁虛論者，其失大」指《公羊傳》、《穀梁傳》偏重於「經」的層面，而缺失相對較大。

綜上所論，雖然館臣以「經」、「史」之交互理解關係為《春秋》學的解釋基礎，但在「徵實」的學術判準與前提下，²⁹ 館臣以「書寫行為」與「言說活動」、「歷史事實」與「經學大義」兩組觀念，思考三傳之「範型性」義蘊時，「書寫行為」與「歷史事實」在三傳文本中形成的詮釋情境，實具有相對客觀的詮釋基礎。

三、以「舍傳求經」之內涵分疏各家春秋學之脈絡

透過前文所論館臣如何重塑三傳之「範型性」意義之後，本節將繼續討論館臣如何在三傳之「範型性經說」的思考基礎上，進一步分疏歷代《春秋》學之源流正變關係。「宏觀」的看，既然三傳作為《春秋》學之「範型性經說」，則歷來的詮釋者皆或多或少無法避免三傳的「正向」或「負向」的範型意義；即如《四庫全書總目·史部類敘》所云：「儒者好為大言，動曰舍傳以求經，此其說必不通。其或通者，則必私求者諸傳，詐稱舍傳云爾」。³⁰如此，「舍傳求經」之現象原應屬於《春秋》學「方法論」（methodology）層面的討論，但「微觀」的看，其「不通者」與「通者」在內涵上的差異，也往往牽動了館臣之「《春秋》學譜系」的論述，討論如下：

²⁹ 清·永瑤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六，春秋類序，春秋類一，頁 210。

³⁰ 清·永瑤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五，史部總敘，正史類一，頁 397。

（一）「舍傳求經」之「不通者」之限制及其脈絡

館臣對於歷來「舍傳求經」之「不通者」的解經現象多有批評，而此亦往往牽涉其「《春秋》學譜系」的認知與理解。依此，就其「限制」又可歸納為三個方向：

其一，舍傳求經將失去解經的依據。如：呂祖謙（1137-1181）《春秋左氏傳續說》提要云：「蓋祖謙邃於史事，知空談不可以說經，故研究傳文，窮始末以核得失，而不倡廢傳之高論，視孫復諸人，其學為有據多矣」；^{③①}而此類的代表如：季本（1485-1563）《春秋私考》，其提要云：「本不信《三傳》，故釋經處謬戾不可勝舉……，程端學諸人之疑傳，不過以所記為不實而已。未有於二千餘年之後，杜撰事蹟，以改易舊文者。蓋講學家之恣橫，至明代而極矣」；^{③②}又如朱奇齡（?-1692-?）《春秋側微》，其提要云：「大旨以意揣量，據理斷制，而不信《左氏》之事實，故往往不考典制，不近情理」。^{③③}依此，季本、朱奇齡之「杜撰事蹟」、「不考典制」等解經方式，主要都是「舍傳求經」的取法上，失去根基的現象。

其二，舍傳求經將導致經說義例的廢亡。如：程公說（1171-1207）《春秋分紀》提要云：「宋自孫復以後，人人以臆見說《春秋》，惡舊說之害己也，則舉三傳義例而廢之」。^{③④}此類的代表如：鍾芳（1476-1544）《春秋集要》，其提要云：「其採用《公》、《穀》月日之例，既多附會，而採用《左傳》，尤無體例」。^{③⑤}如此，在不採三傳義例的情況下，論者對於三傳之「事」、「義」的取捨，亦失其依據。

其三，舍傳求經遂使經解出於臆測。如：《御纂春秋直解》提要云：「自啖

^{③①} 清·永瑤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七，春秋類二，春秋左氏傳續說，頁 221。

^{③②} 清·永瑤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春秋類存目一，春秋私考，頁 246-247。。

^{③③} 清·永瑤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一，春秋類存目二，春秋側微，頁 258。

^{③④} 清·永瑤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七，春秋類二，春秋分紀，頁 222。

^{③⑤} 清·永瑤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春秋類存目一，春秋集要，頁 246。

助、趙匡倡爲廢傳解經之說，使人人各以臆見私相揣度，務爲新奇以相勝，而《春秋》以荒」。³⁶此類的代表如：朱之俊（1596-1671）《春秋纂》，其提要云：「是書大抵隨文生義，罕所根據。……至於災異，必推事應，尤多穿鑿」。³⁷依此，在失去三傳作爲《春秋》學詮釋基礎的情況下，解經者遂往往只能直抒胸臆，出於臆測。

據此，我們亦可再次由上述三種「舍傳求經」之「不可通」，反證而理解《三傳》之「範型性」義涵；同時也可透過其「限制」義的分疏，理解館臣對此類《春秋》學著作間的關係。

（二）「舍傳求經」之「通者」的轉化及其脈絡

關於「舍傳求經」之「通者」的轉化內涵，主要可見程端學《春秋三傳辨疑》提要云：

蓋不信三傳之說，創於啖助、趙匡（案韓愈《贈虜酋》詩有：「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之句。全與啖、趙同時，蓋亦宗二家之說者。以所作《春秋摘微》已佚，故今據現存之書，惟稱啖、趙。）其後析為三派：孫復《尊王發微》以下，棄傳而不駁傳者也；劉敞《春秋權衡》以下，駁三傳之義例者也；葉夢得《春秋讞》以下，駁三傳之典故者也。³⁸

此中，「不信三傳」並非指對於三傳經說的完全拋棄，而是鬆動了「三傳之說」對於「春秋本經」的「正向範型」詮釋效力。如此，館臣所分「棄傳不駁傳」、「駁傳之義例」、「駁傳之典故」三派，亦值得我們玩味出不同的思考線索，即：

（一）「棄傳不駁傳」與「經傳一體的文獻性反思」，即「解經之文獻」與「解經之詮釋」的分別問題。例如：孫復（992-1057）《春秋尊王發微》提要

³⁶ 清·永瑤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九，春秋類四，御纂春秋直解，頁 235。

³⁷ 清·永瑤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春秋類存目一，春秋纂，頁 249。

³⁸ 清·永瑤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八，春秋類三，春秋三傳辨疑，226。

所云：「復之論上祖陸淳，而下開胡安國」。³⁹則陸淳（?-806）、孫復與胡安國（1074-1138）在《春秋》學的類同性，並非在於經說學脈的繼承，而是在於如同三傳直接面對《春秋》本經的「詮釋層位」。

(二)「駁傳之義例」與「三傳解經的方法性反思」，即「義例之得」與「義例之失」的正當問題。例如：湛若水（1466-1560）《春秋正傳》提要云：

「此書大旨以《春秋》本魯史之文，不可強立義例，以臆說汨之，惟當考之於事，求之於心，事得，而後聖人之心、《春秋》之義皆可得。因取諸家之說釐正之，其曰「正傳」者，謂正諸傳之謬也。其體例先引三傳，次列諸儒之言，而以己意爲之折衷，頗與劉敞《權衡》相近」。⁴⁰如此，雖然湛若水以「心學解經」爲其《春秋》學取向，但面對三傳義例之「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時，其「據義考例，折衷三傳」的態度則與劉敞（1019-1068）是類同的。

(三)「駁傳之典故」與「三傳事證的考證性反思」，即「禮制」與「經義」的關係問題。例如：張大亨（?—?）《春秋五禮例宗》提要云：「孫復作《春秋尊王發微》，葉夢得譏其『不深於禮學，故其言多自抵牾』。蓋《禮》與《春秋》本相表裏。大亨是編，以杜預《釋例》與經踳駁，兼不能賅盡，陸淳所集啖、趙《春秋纂例》亦支離失真，因取《春秋》事蹟分吉、凶、軍、賓、嘉五禮，依類別記，各爲總論。義例賅貫，而無諸家拘例之失」。⁴¹依此，就「禮」學作爲《春秋》學之基礎而言，葉夢得始開啓對三傳所載之禮制的檢討，而張大亨則更進一步超越三傳的範圍，檢討了杜預（222-284）、啖助、趙匡、陸淳以來的禮說。

綜上所論，「舍傳求經」在不同面向的轉化，往往在三傳的基礎上，依其目的或是方法交織了歷來《春秋》學的不同脈絡。然而，就「通者」與「不通者」的差別而言，則往往在於解經者對於三傳之「範型性經說」，自不同層面的「正

³⁹ 清·永瑤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八，春秋類一，春秋尊王發微，214。

⁴⁰ 清·永瑤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八，春秋類三，春秋正傳，頁230。

⁴¹ 清·永瑤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七，春秋類二，春秋五禮例宗，頁218。

向」或「負向」的認知，進而延伸其對於三傳的取捨與應用。

四、以其「《春秋》學譜系」之相關問題 反思官方解經典範的建構

由上兩節的討論中，以「目錄學」的角度觀之，我們從《總目》中發現了館臣如何藉由經典詮釋的相關問題，思維了歷來《春秋》經解的源流正變；然而，從「春秋學」的角度論之，爲了瞭解四庫館臣本身以致於「經稟聖裁」的官方立場及其不同目的，則又或須從《日講春秋解義》、《御纂春秋直解》與《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之提要，抽繹其相關問題，以反觀其官方解經典範的建構。如此，依據經解對於不同對象的功能性，又可分析如下：

（一）以帝學之目的觀照經世樞要之建立

「經筵講章」作爲經學詮釋的某一種類型，就主要目的而言，往往未必聚焦於「聖人大義」或「經典本義」之相對客觀性問題的爭論，而是在詮釋的理路中如何被「帝王」應用於實際經世的情境脈絡之中，即如館臣在說明《日講春秋解義》之目的時所云：「反覆演繹大旨，歸本於王道，允足明聖經之書法，而探帝學之本原」。⁴²雖然目的不同，但較之《四庫全書》其他收錄僅偏向學術性的《春秋》學經解著作，仍可從「文獻基礎的同一」與「詮釋情境的差異」分析其同異關係如下：

1. 就「文獻基礎的同一」的角度觀之，主要又回歸了三傳對於《春秋》學詮釋的基礎問題，在此則是館臣就「範型性經說」對於官方解經典範之意義與效用的考慮。如此，《日講春秋解義》提要所稱：「每條先列《左氏》之事蹟，而不取其浮誇」、⁴³「次明《公》、《穀》之義例，而不取其穿

⁴² 清·永瑤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九，春秋類四，日講春秋解義，頁234。

⁴³ 同前註。

鑿」。此中，「不取其浮誇」與「不取其穿鑿」仍是分別就「歷史事實」與「經學大義」等面向反思三傳對於官方經說的範型性意義。而對三傳詮釋效度區分，亦可見館臣對於前代「經筵講章」的理解，如戴溪（1141-1215）《春秋講義》提要所稱：「其所釋經文，多從《左氏》，故其間從《公》、《穀》者，並附案語於下方焉」，⁴⁴亦可見其端倪。如此，無論以從學術、政治，抑或是即政治即學術的角度切入，三傳在館臣《春秋》學的思考中，僅管詮釋的範型與效度不一，其在「文獻」上的基礎意義仍是相同的。

2. 復以「詮釋情境的差異」論之，雖然「經筵講章」一類的《春秋》學著作，在「文獻基礎」方面與其他類型的經解並無太大的差異，但在目的不同的情況下，其詮釋經驗的來源亦不相同。以《日講春秋解義》為例，主要的來源有二：(1)皇帝經世的詮釋，即館臣所云：「是書為聖祖仁皇帝經筵舊符，世宗憲皇帝復加考論，乃編次成帙」；⁴⁵(2)經筵講官的經解，亦如提要所稱：「是編因宋儒進御舊體，以闡發微言」，⁴⁶如此，以「奏御之體」⁴⁷為式的經筵講章，在「當其功罪」、「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⁴⁸的目的下，自然須要皇帝與經筵講官的經驗共同完成其詮釋，而與「章句之學」⁴⁹的經解有所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1622-1722）《日講春秋解義·序》所云「爰命儒臣撰集進講，大約以胡氏為宗，而去其論之太甚者」，⁵⁰即以胡安國（1074-1138）《春秋傳》為其文獻之基礎；而所謂「雖持論過激，抉隱太嚴，未必當日聖心皆然」。

⁴⁴ 清·永瑤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九，春秋類四，日講春秋解義，頁234。

⁴⁵ 同前註。

⁴⁶ 同前註。

⁴⁷ 同前註。

⁴⁸ 同前註。

⁴⁹ 同前註。

⁵⁰ 清·庫勒納、李光地等奉敕撰：《日講春秋解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臺灣商務書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本，1983年），卷一。

於《春秋》大旨，十常得其六、七，較之漢唐以後諸家優矣」⁵¹之說，亦以胡氏傳為詮釋之範型。準此，對照《日講春秋解義》提要於胡氏傳之隻字未提，以及前文第二節的論述，更見館臣並未全然因襲胡氏傳對宋代以降《春秋》學的影響，亦以三傳之「範型性」意義思考了「春秋學」之經世樞要的相關問題。

（二）以經傳關係作為士人功令依據之反思

經傳關係一直是《春秋》詮釋史的重要問題之一，特別是三「傳」代表的意義究竟只是「經」的一種詮釋進路，又或者在詮釋的過程中也逐漸成為一種文獻基礎，向為歷來詮釋者聚訟紛爭之處。對此，就《總目》的情形而論，本文在第一節已從「目錄學」的角度，論述館臣思考中，三傳於不同向度的「範型性」意義；另一方面，從「官方《春秋》學」的角度而言，自宋代以後，自難以忽視胡安國《春秋傳》的影響。例如：館臣於胡《傳》提要云：「明初定科舉之制，大略承元舊式，宗法程、朱，……當時所謂經義者，實安國之《傳》義而已」。⁵²其後，胡廣（1369-1418）等奉敕之《春秋大全》，館臣於《總目》亦云：「其書所採諸說，惟憑胡氏定去取，而不復考論是非。有明二百餘年雖以經文命題，實以傳文立義」。⁵³如此，當館臣在建構「官方《春秋》學」的同時，三《傳》、胡《傳》與《春秋》詮釋的關係，以至於歷來「經」、「傳」關係所涵蘊的問題，也就成為館臣在思考《春秋》學時的重要向度之一。以下再以「傳」與「經」的角度分別論之。

1. 「傳」之彙纂性詮釋的批判與融合

就經典詮釋的過程而言，歷來詮釋者在累積了一定的詮釋經驗之後，後起的詮釋者往往會對先行詮釋者的解讀，相應其不同的目的或是方法的差異，進行批判、揀擇、融貫甚至轉化性的應用。依此，不僅私人的經解性著作如此，以「蕩前門戶，辯別是非」⁵⁴為目的的「官方《春秋》學」也是如此。以《欽定春秋傳說

⁵¹ 清·庫勒納、李光地等奉敕撰：《日講春秋解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一。

⁵² 清·永瑤、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七，春秋類二，春秋傳，頁219。

⁵³ 清·永瑤、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七，春秋類二，春秋大全，頁230。

彙纂》與《御纂春秋直解》為例，我們亦可藉由館臣於《總目》所論述之不同層面分析如下：

- (1)以「傳」解「經」的批判及其反思：館臣對於這部分的反思又可從「科舉性應試」與「學術性研究」兩個層面來說明。前者如《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提要云：「明馮夢龍作《春秋大全凡例》稱：『諸儒議論，儘有勝胡《傳》者，然業以胡《傳》為宗，自難竝收以亂耳目。』豈非限於科律，明知其誤而從之歟？」⁵⁴則胡傳之「範型性」所衍生而來的問題，即科舉之目的壓縮了學術存真的需求，致使諸儒礙於功令而不能辨其是非；後者如《御纂春秋直解》提要引朱子之說云：「《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紀事安有許多義例」，⁵⁵亦指傳例的繁複，非但不能釐清經典大義的問題，反而招致解讀的困擾。如是，雖然學術與政治之間的界線未必明確，但從其交互的關係中也不難發現，當「傳」之詮釋效力擴大，其「範型性」逐漸建立之後，則「經」在文獻解讀上的優先性則會受到相對的減弱。
- (2)合「傳」解「經」的融貫與應用：雖然館臣在《總目》中多已批評「傳」對於「經」之詮釋的「求之過深」，而「傳」在不同詮釋脈絡下的應用也或著存在「過度詮釋」（over-interpretation）的問題；但也如同前文所論，館臣對於「舍傳求經」的現象，也同時存在了「通者」與「不通者」的評判。那麼回到館臣本身的「官方《春秋》學」立場而言，雖然沒有特別對三傳之得失做出評論，但是對於胡傳之得與失則多有著墨，如《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提要所稱：「雖俯念士子久誦胡《傳》，難以驟更，仍綴於《三傳》之末，而指授儒臣，詳為考證，凡其中有乖經義者，一一駁正，多所刊除。至於先儒舊說，世以不合胡《傳》擯棄弗習者，亦一一采錄，表章闡明古學」。⁵⁶如此，則不僅「三傳」有其「範型性」，胡傳以至於先儒舊

⁵⁴ 清·永瑤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九，春秋類四，欽定春秋傳說彙纂，頁 235。

⁵⁵ 同前註。

⁵⁶ 清·永瑤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九，春秋類四，御纂春秋直解，頁 235。

⁵⁷ 清·永瑤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九，春秋類四，欽定春秋傳說彙纂，頁 235。

說亦有其參照性意義。但值得注意的是，從《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辨正胡傳又同時表章古學的情形看來，更顯出館臣調和「科舉」與「學術」之目的，存在的詮釋衝突與張力。

2. 「經」之文獻主體性的回歸與解讀

此處所稱「『經』之文獻主體性的回歸」並非指「舍傳求經」一類，僅就「詮釋層位」而論，而是在衡量諸家傳說等「文獻基礎」或「詮釋效力」的考慮中，對於《春秋》經的解讀，試圖回歸到「作者本義」的期待視域裡。例如：《御纂春秋直解》提要一開始即云：「旨在發明尼山本義，而鏟除種種迂曲之說。故賜名曰『直解』」，⁵⁸顯見館臣對於歷來傳說之偏的反省，因此，從《春秋》詮釋史的脈絡考察，關於「傳」對於「經」的詮釋效力問題，館臣於《御纂春秋直解》主要提出了以下的批評：(1)舍傳解經將流於臆見，如其云：「自啖助、趙匡倡為廢傳解經之說，使人人各以臆見私相揣度，務為新奇以相勝，而《春秋》以荒」，⁵⁹而這個批評，主要仍是站在三傳的立場而論。如此，從「官方《春秋》學」的角度來說，亦可復證館臣以三傳同為《春秋》學之「詮釋」與「文獻」基礎的思維理路；(2)嚴從傳例將失於苛深，如其云：「自孫復倡為有貶無褒之說，說《春秋》者必事事求其所以貶，求其所以貶而不得，則鍛鍊周內以成其罪，而《春秋》益荒」。⁶⁰儘管孫復如前文所論或為「棄傳不駁傳」的代表，並且企圖如同三傳的「詮釋層位」一般直接面對《春秋》，但其「有褒無貶」的傳例原則，亦可能存在了求之過深的問題。

如此，反觀前論館臣對於「舍傳求經」之「通者」與「不通者」的評論與分疏，則館臣在建構「官方《春秋》學」的時候，也往往將這些情形考慮進去，故而先有論衡諸傳舊說的《御纂春秋傳說會纂》，其後又企圖直接面向孔子而有《御纂春秋直解》一書，其思維方式皆是將「官方《春秋》學」的建構，在「經世樞要」的實存情境中，迴向而反覘於《春秋》詮釋史的脈絡之中。

⁵⁸ 清·永瑤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九，春秋類四，御纂春秋直解，頁235。

⁵⁹ 同前註。

⁶⁰ 同前註。

五、結論

綜合以上的討論，《四庫全書總目》之「《春秋》學譜系」主要蘊涵了三個主要的思維方式：(一)以《春秋》學之解釋基礎重塑其「範型性經說」的意義與效用；(二)以「舍傳求經」之內涵分疏各家《春秋》學之脈絡；(三)以其「《春秋》學譜系」之相關問題反思官方解經典範的建構。

其一，「範型性經說」的構造方式又指向了兩個層面，即：1、「言說活動」與「書寫行為」之傳習方式及其詮釋基礎；2、「經」、「史」內涵的同異問題及其理解關係。前者主要說明館臣顯豁了《左傳》之「書寫行為」與《公羊》、《穀梁》「言說活動」對於《春秋》學詮釋影響；後者則進一步說明，以《左傳》重「歷史事實」、《公羊傳》、《穀梁傳》重「經學大義」的分疏中，雖三傳同構為《春秋》學詮釋基礎，但在「徵實」的判準中，《左傳》在館臣的觀念中，實提供了較為相對客觀的理解基礎。

其二，以「舍傳求經」之內涵，對於歷來《春秋》學之錯雜脈絡的分疏，亦可從：1.「不通者」之限制與 2.「通者」之轉化，進行理解。前者主要包括：「舍傳求經將失去解經的依據」、「舍傳求經將導致經說義例的廢亡」與「舍傳求經遂使經解出於臆測」等三種方向；後者就現象及其蘊涵之問題則有：「棄傳不駁傳」與「經傳一體的文獻性反思」；「駁傳之義例」與「三傳解經的方法性反思」；「駁傳之典故」與「三傳事證的考證性反思」等區分。

其三，官方解經典範的建構，在面對不同對象的思考中，館臣一方面「以帝學之目的觀照經世樞要之建立」；另一方面又「以經傳關係作為士人功令依據之反思」。前者原係「經筵講章」，為皇帝所受學專用；後者則基於科舉與學術之間的緊張關係，反思歷來舊儒「傳」說對於「經」之詮釋效力等問題。此中，館臣在《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與《御纂春秋直解》之間，又同時蘊涵了「『傳』之彙纂性詮釋的批判與融合」與「『經』之文獻主體性的回歸與解讀」等思維方式。

據此，《四庫全書總目》之「《春秋》學譜系」就在館臣重塑三傳之「範型性」義蘊，與區分「舍傳求經」之內涵的思考中，形構於各家提要的論述之間，

從而反思「官方《春秋》學」典範的建構。

引用文獻

古籍原典

（經部）

清·庫勒納，李光地等奉敕撰：《日講春秋解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臺灣商務書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本，1983年。

清·焦循《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5月。

（史部）

唐·魏徵等《隋書》，台北：鼎文書局，1975年。

清·朱彝尊撰，林慶彰等主編：《經義考新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

清·永瑢、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浙本、殿本、粵本互校本，2008年11月。

現代學術論著

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年。

張舜徽：《四庫提要敘講疏》，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

單篇論文

丁亞傑：〈春秋寓於史：《四庫全書總目》的春秋學觀〉，《儒學研究論叢》第三輯（台北：台北市立教育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儒學中心，2010年12月），頁185-208。

周彥文：〈論提要的客觀性、主觀性與導引性〉，《書目季刊》，第39卷第3期（2005年12月），頁23-38。

夏長樸：〈《四庫全書總目》對宋代經學的觀察——以《春秋》學為例〉，台北：台灣大學，第四屆中國經學國際研討會宣讀論文，頁147-168。

楊晉龍：〈「四庫學」研究的反思〉，《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期（1994年3月），頁349-394；〈「四庫學」研究方法芻議〉，《乾嘉學者的治經方法》（上），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0年10月，頁

17-54。

蔣年豐：〈從「興」的現象論《春秋》經傳的解釋學基礎〉，收錄於楊儒賓 黃俊傑編《中國古代思維方式探索》，台北：正中書局，1996 年 11 月，頁 85-134。

劉兆祐：〈民國以來的四庫學〉，《漢學研究通訊》，第 2 卷 3 期（1983 年 7 月），頁 146-151。

謝德勝、鹿苗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的宋代「春秋學」〉，《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09 年 10 期），頁 33-36。

Modes of Thinking Implicated in Pedigree of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of Catalog of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Chiang, Yuh Chyi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Taipei Municip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Academic perspectives implicated in Catalog of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are normally the threshold for the future researchers. Take the relevant issues of “Catalog” and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for example, according to the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the mainly research themes are to Clarify the implications in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implicated implicate in “Catalog, to bring up rectification and discuss the influence and meaning of its academia tendency. Reflect the basic concept of Catalog to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nd analyze its’ the appraisal and flaws to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hroughout the history. In addition, there are three notable points during the writing process of the officials in the Four Vaults. What are the thinking and horizon being implicated when the officials use the Three Commentaries to distinguish and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of coherent varieties between each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sects?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e comment of She Shuan Qiu Jing for the officials to classify the thread of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hroughout the history? How the officials construct the model

of official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ccording to the foundation above?

Therefore, this article tries to use ideas from Pedigree of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o explore and clarify the related thinking in Catalog which have not been discussed. That is, to use the structure of “ZongXu-XiaoXu-TiYao-AnYu” of the Catalog to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sects research throughout the history in the “formalized method” and “Spiritual purpose” discussed in down-passing and branching relationship aspects, and try to reveal the logic sequence view points behind the discussion, and also clarify the modes of thinking of the officials in Four Vaults to the Pedigree of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Keywords: Catalog of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Pedigree of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modes of thinking, spiritual purpose, paradigmatic interpretation

